

国际广播丛书之五

电波联结五洲情

主 编 闫惠朝

副主编 徐永秀

郭景哲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沈炽锐

版式设计：周 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波联结五洲情/闫惠朝主编. —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10

(国际广播丛书；5)

ISBN 7-5078-1388-6

I. 电… II. 闫… III. 国际广播-广播工作：群众工作-中国 IV. G22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5403 号

国际广播丛书之五

电波联结五洲情

闫惠朝 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编：10086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 9.75印张 233千字

1996年10月 第1版 1996年10月 第1次印刷

印数：2000

ISBN 7-5078-1388-6/G·662 定价：19.00元

目 录

总序 总结经验 继往开来	孙家正
前 言	(i)
难忘的情与爱	郭世炽 (1)
一位非洲听众的中国情结	张 敏 丁邦英 (7)
电波传友谊 情深意更切	周财振 (14)
电波——友谊的纽带	王档春 (20)
美好的瞬间	温 飏 (24)
一束鲜花寄友情	郭景哲 (28)
从友谊中得到安慰	陈丽芳 (30)
美国听众麦克吉邦领奖回国后	陈丽芳 (34)
遍布七十个国家的世界语听众	刘俊芳 (37)
我们世界语广播的日本听众	薛梅仙 (43)
沿着绿川英子的足迹	李玉萍 (49)
韩国有我们的好听众	薛梅仙 (54)
听众中有我的一个“同行”	冯玉英 (58)
平野知行在中国电台喜过生日	薛 移 (62)
一位日本农民听众的北京之行	薛 移 (65)
中国迷——坂田大姐	贾磐朴 (68)
特别的旅行 特别的爱	薛 移 (71)
回忆斯里兰卡朋友	郭景哲 (74)
擎起中巴友谊旗帜的人	董立芬 (81)
我接触到的巴基斯坦听众	董立芬 (84)
听众叫我“嘉嘉赵”	赵景秀 (87)

“承德杯”的震撼	孙莲梅 (91)
又见巴布尔	张莲玉 (95)
一位特殊的小听众	张莲玉 (100)
啊! 中国、北京	史文珍 (106)
珍藏在心中的深情	尹凤铤 (110)
我所认识的蒙古听众	潘晓英 (114)
在老挝见到的几位听众	张翠玲 (118)
难忘的记忆	沈 晖 (120)
短暂的偶遇	陈 强 (125)
一个泰国残疾姑娘的故事	邱 杨 (126)
三位越南学生	张 余 (131)
范氏明庄的中国情	刘月莹 (139)
有朋自远方来	顾鸿富 (145)
我们的菲律宾听众	于熙君 (148)
珍贵的友谊	李 宁 (151)
我们的柬埔寨听众	郭翔青 周红心 (153)
中国广播迷	缅甸部 (159)
访孟拾零	冯玉英 (163)
一位印度听众的婚礼	孙国强 (169)
三位泰米尔听众	张俊杰 (171)
巴德利的心愿	胡唯敏 (174)
友谊的聚会	邹肇军 (179)
阿吉扎·托依, 你在哪里	肖 兵 (182)
两位伊朗小姑娘	高瑞英 (185)
来自土耳其的两个故事	魏秋芬 (188)
六封来信的背后	何大明 (192)
南斯拉夫听众沙邦一家	何大明 (199)
四位获奖听众	杨学苜 (204)

我永远是你的忠实听众	骆东泉 (209)
半个中国人	骆东泉 (212)
波拉的夙愿实现了	李家渔 (214)
瓦尔高的中国梦	叶 珍 (219)
倾听中国之声的人	周宝义 范建平 (224)
一位波兰农民的中国情	杨 馨 (230)
捷克听众杨吉	包云南 (232)
地中海边的艳丽鲜花	刘元培 (235)
“中国永远在我心中”	吴茵萱 (240)
在听众阿克马尔家作客	刘传锦 (243)
北京使他们着迷	杭三丁 (246)
第一个来信的西语听众	杨林常 (250)
老朋友阿尔弗雷多	马恩禄 (252)
“真希望再去一次中国”	单德海 (254)
在中国结识的异国姐弟	冯茹凤 (257)
一个德国的“中国迷”	程秀芬 (260)
我所了解的华语广播听众	刘丽斌 (262)
外国听众的西藏之行	林星灿 (266)
寄托着友谊的艺术品	郭景哲 (270)
附件 1: 我台举行 1992 年听众工作庆功会	(275)
附件 2: 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的贺信	(278)
附件 3: 发扬成绩, 向更高的目标前进——艾知生部长在 国际台听众工作庆功会上的讲话摘要	(280)
附件 4: 1985—1995 年全台听众来信一览表	(283)
1985—1995 年各大洲听众来信数量表	(283)
附件 5: 近年来举办的听众竞赛活动简况	(284)
附件 6: 历次听众工作评比表彰名单	(285)
后记	(288)

难忘的情与爱

郭世炽

1989年6月至1991年8月，我被借调在坦桑尼亚的中国煤炭专家组驻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办事处工作。煤炭专家组有近200号中国人，驻扎在离首都1000公里外的山区。办事处只有我和厨师两个人，主要负责双方官员之间的联络，生产所需材料供应，接待过往人员，以及采购中国人的后勤物品等。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码头、机场、移民局；海关、法院、警察局；商店、银行、邮电局；公园、饭店、旅游局，几乎什么单位我都跑遍了。在工作中我感到处处有我们电台的朋友，行行有我们的听众。有很多感人肺腑的事情，充分表现了听众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感情和爱戴。

一、特别通行证

坦桑尼亚首都机场建得很雄伟，管理也比较严。除大使馆少数工作人员持机场通行证可以进入外，其他人很难入内。我不在使馆工作，自然没有通行证，但我可以自由出入。

我每周都要去机场送人或接人。不管是行李员还是安检员，也不管是海关口还是防疫处，只要我一出现就有人热情地打招呼，有的还喊：“欢迎，桥。欢迎，桥”。桥，就是友谊之桥的桥。

有一次我去接人。这一天机场出口处围的人比往常要多，有欧洲人、亚洲人，更多的是当地人。我一打听，才知道是有重要活动，有通行证也不准进去。我像往常一样，穿过人群径直走到门口，习惯地和门卫握握手就进去了。突然，有个白人问：“他为什么可以进去？我有证件倒不能进去？”

“今天要特别通行证。”门卫夏巴尼先生把我召回到门口，指着我对大家说：“他是从中国电台来的，我们的朋友。”随后，夏巴尼先生双手在我胸前把衬衣抚平，以便我穿在里面的圆领衫上的电台标志显得更清楚，他向那位白人扫了一眼说：“看见了吗？这就是特别通行证。”随着一阵掌声，人们一边向我招手，一边喊：“朋友，中国电台！朋友，中国电台！”……

二、特殊保镖

乞力马扎罗饭店是坦桑尼亚首都最高级的饭店，从级别来讲相当于我国的北京饭店。因工作需要，我经常去那里。

我这个人开车不爱用空调。总是穿一件我台印制的圆领衫，带上衬衣上车。下车后，穿上衬衣去办事。平时，我到这家饭店办事，并不大注意我的车有什么变化。偶尔察觉车玻璃似乎有人擦过，也不上心。一天，我去这家饭店，因一段路面有水，车子被溅了些泥点。当我办完事出来时，惊讶地发现我的车变干净了。是谁擦的呢？我环视四周，停车场内没有人，其他车也没有擦过。大街上倒是有从事擦车来维持生计的人，但这个地方历来就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从此，我特注意车子的外观变化。我发现，到这家饭店办事，我的车常常有人擦。我曾问过门卫，他们只说：“是你的特殊保镖干的。”

一天，我把车停好后，走进了驻这家饭店的机票代理行。我佯装待购机票，从窗户往外观察。不一会儿，一个小伙子走过去擦车。我定神一看，原来是奥马尼。他是我台的听众，专门负责

饭店周围的安全保卫工作。他和他的伙伴经常收听我们中国电台的广播，所以对中国电台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是一次偶然的机，在我下车穿衬衣时，他看见我穿的圆领衫上有中国电台的台标，便跟我打招呼。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每当我到这里办事，只要一碰面，总要先聊一会儿。

我迅速走出饭店，上前和他打招呼。他见我这么快就出来了，感到不好意思，只是乐呵呵地对我笑。这时，他的一个同伴走过来：“兄弟，我们就算是特殊保镖，你尽管放心去办事”。奥马尼一边点头一边笑着说：“我们在一起上班，我们会轮流为你看护好车子。”

我开心地笑了。作为中国国际电台的一员，在异国他乡居然有特殊保镖，真让我感到自豪。

三、特种服务

在坦桑尼亚的外国人都爱逛鱼市。我常去的那个鱼市就在海滩上，各种各样的海鲜应有尽有，五颜六色的贝壳使人眼花缭乱。

我在这个鱼市享受特种服务。我买的对虾个大均匀，买的螃蟹体肥黄多，不仅价格便宜，而且份量足。不过，我也是吃过亏的。

我第一次上鱼市，就听说一个欧洲人买了10公斤对虾，少了差不多3公斤。我买回5公斤对虾，一称也少了半公斤。第二次上鱼市，我先和摊主们聊天。才知道摊主们喜欢宰欧洲人和日本人。可是，摊主们又分不清中国人日本人。由于挣钱的心理作用，摊主们从来不会把日本人错当中国人，而是把中国人错当成日本人，故意把价抬高。当他们知道我是中国人，又讲斯瓦希里语，一下围上来十几个人，打听中国电台的事。我心里可高兴了，在这儿又碰上了我们的知音。我兴致勃勃地回答他们的问

题，从衣袋里拿出电台的徽章送给他们，他们显得比我还高兴，拿着徽章看来看去，有一个探过头来对我说：“你买我们的东西，任你挑，任你选。我们保证份量，不抬价钱。”第三次上鱼市时，我一下车就碰见一个胖小伙子。他看见我穿着带有台标的圆领衫，便走过来和我说话。原来他听摊主们说起我这个人，就在这里等了几天。一是想和我聊聊天，二是想要我台的徽章。在交谈中，我给他介绍了我台的概况、斯瓦希里语广播部的工作及听众来信情况。随后，我送给他一枚徽章。他兴奋地接过徽章翻过来、倒过去看了一会儿，就别在前胸的衬衣上。接着，他拉着我走到虾摊前，指着我对货主们说：“他是我们中国电台的朋友、客人，你们对他必须提供特种服务，也就是说给批发价，给最好的货。你们这样做了，第二天告诉我，我给你们补偿。”又拉我到蟹摊前，对摊主们照样说了一遍。

我回到停车场，把买好的海鲜放进车里。这时，有一个人走到我身旁说：“你好，朋友。”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第一次买对虾的摊主。他把半口袋对虾塞给我，低声地说：“我也是你们的听众。上次我把你当成日本人，价钱高了，份量少了。”我坚持不要，他坚持不走。我怕误了他的生意，只好收下他那份情，回赠给他几个电台的小纪念品。此时，他那阴沉的脸立刻变得开朗了。他高兴地告诉我，那个胖小伙是鱼市的一“霸”，摊主们都叫他“头”，不叫他的名。这位“头”非常喜欢听中国电台的广播，经常是先收听，然后吃饭，睡觉。天不亮就开车到渔船码头收购虾和螃蟹，再赶回鱼市批发给摊主们。

从那以后，我在鱼市就一直享受特种服务。

四、特许车号

很多交警和我很熟悉，甚至我的车号他们都知道。一天，我和一位当地的朋友急需到港口办理提货手续，在一个十字路

口，因刚刚发生意外事故，交通堵塞了，几个警察正在现场忙于勘查。我减速行驶，在离前面那辆车较远的地方停住了。一是想随时离队，掉头改道；二是希望警察看见我的车号，帮我绕道前进。这个地方路面比较窄，而且又是上班时间，车特别多，要掉头改道是非常困难的。怎么办呢？我正着急时，一个负责维持交通秩序的警察发现了我的车号，他走到车前和我打个招呼，就引我进入下行车道。在他的指挥下，我顺利地过了十字路口，及时到达港口。事后，那位当地朋友问我：“你的车是特许车号吗？为什么为你特别开道？”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在城里办事晚了，肚子又饿，不想绕道去水果市场，打算在这个路口附近买点水果带回去。我一下车，正好与一个警察相遇。他盯着我穿的圆领衫上的台标，像见了老朋友似的握住我的手：“啊！中国电台的朋友。”他分给我一个香蕉：“我们经常听你们的声音，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我太高兴了！我太幸福了！”我一听，肚子也不饿了，就和他聊起来了。据他介绍，从修建坦赞铁路起，坦桑尼亚人，甚至东非人都非常熟悉中国这个名字，但不了解中国。他说：“一个人对他熟悉的地方，而又不了解，其痛苦是难以言传的。为了消除这种痛苦的折磨，我们就得想办法了解中国。参观访问和买书订报，就经济而言是绝大多数人承受不了的。所以，我们都选择收听中国电台的广播。”我想询问他有关收听情况，但他接班的时间到了。从此，找我谈天的警察越来越多。也因此，我的车号就被越来越多的交警知道了。

后来，我换了一部新车。有一天，我去移民局办事，通过一个路口时，一个警察示意我停车。我知道这是警察下班，要搭便车回家，我便把车停在路边等。当这个警察走到车前，一看是我，“咔嚓”一声皮鞋碰击声，他立正行了个军礼。我下车和他握手。他笑着问：“什么时候换车了？”在我们交谈时，一些行

人都好奇地停下来看热闹。这位警察拉着我的手对他们说：“他是中国电台的，我们坦桑尼亚的朋友。”路边的人都笑着伸出手，我一一和他们握手，欢迎他们收听中国电台的广播。

不多久，我的新车的车号，又成了特许车号。

(1995年5月《国外听众反映》)

一位非洲听众的中国情结

张 敏 丁邦英

1991年底至1993年底，我们奉派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肯尼亚内罗毕记者站记者。1993年底，我们赴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采访东南非洲优惠贸易区首脑会议期间，我驻乌使馆、中国公司及华侨不断向我们提及一位名叫瓦弗拉的乌干达朋友，并讲述了不少有关他对中国友好的故事，引起了我们采访的欲望。一天下午，他十分高兴地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崇尚鲁迅文学的留学生

秘书小姐刚把我们引进套间的办公室门口，一位40来岁、衣着随意的黑人男子便笑着迎上来——不用说，他就是瓦弗拉先生。

“下午好，瓦弗拉先生。”

“下午好，欢迎！欢迎来乌干达！别客气，随便坐……”

“你的汉语讲得真漂亮！”在黑非洲大陆腹地，看着站在面前这位纯正的黑人汉子，用一连串的汉语客套话同我们打招呼，使我们惊喜不已。

“不行，不行，退步啦，与十几年前相比差得很多很多。”

……

通过交谈得知，瓦弗拉曾于1973年到中国留学，先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一年汉语，后到北京大学攻读了三年文学。他最喜欢中国文学，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他最喜欢鲁迅的小说，特别是有关农民题材的小说。瓦弗拉说，这是因为他的祖国乌干达是农业国，他本人是农民的孩子。因此，他的毕业论文也是有关鲁迅的文学作品，题目是《鲁迅先生的小说与中国农民》。

“瓦弗拉先生，你在北大读了三年文学，回国后工作中用得上吗？”

“当然，学文学不像学理工、学技术。文学不能直接用于工作，但是它给了我思想，鲁迅先生的小说对我认识和分析乌干达社会与农民问题就有很大帮助。”

“自你离开中国至今，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还记得鲁迅吗？还关心中国的事吗？”

“哈哈——”听完这个问题，瓦弗拉不以为然地笑出声来。他回答说：“太忘不了啦，肯定不会忘记的。我家里现在还保存着鲁迅的书，一有空我还拿出来看。我现在还记得教文学的周教授，还有北京语言学院教汉语的李老师。虽然离开北京快20年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新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还有‘天安门事件’，我全都知道。”

“你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中国的？”

“北京电台——对，就是你们现在叫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瓦弗拉先生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与中国广播为伴 20 年

瓦弗拉先生告诉我们，1973年至今，他一直坚持每天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广播。1973年刚到中国时听英语节目，后来开始改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他说习惯成自然，现在收听中国国际电台华语节目已成了他每天生活中一件必不可少

的事。不管工作多么忙，每晚都要听一次。主要是听新闻节目，时间不长，一般15分钟左右。他说他家里属于他自己的一台收音机是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广播专用的，波段是调好不变的，每晚回家一打开就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收听效果很清楚。听完就关机，第二天晚上打开再听。

瓦弗拉对我们说：“你们的广播节目有很大进步，不像以前每天都是讲领导人的事，现在老百姓的事也多起来了，这样好。毛主席说过，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所以老讲领导人的事不好。”

接着，我们请他说说对本台广播节目的意见和建议。瓦弗拉很直率地谈了他的看法。他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一听就是政府的电台，受官方控制。但政府电台的节目形式也有差别。譬如英国广播电台也是政府电台，也受官方控制，相比之下，英国广播电台的节目形式就自由活泼，听了有趣。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编辑同样也可以这样做，甚至超过英国广播电台。他还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了发展，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这些全世界都知道。但中国也不是什么都好，也还有问题。广播要广播好的，也要广播问题，这样才符合事实，人家爱听，听了也信。听了瓦弗拉先生的这席话，暂不论所谈正确与否，单就他的一片坦诚已足使我们深为感动。

瓦弗拉告诉我们，他听了20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广播，这是第一次见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客人，非常高兴。他还特意为我们准备两份小礼品。他说通过每天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广播，有三点收获是不用怀疑的：一是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二是加深了对中国的友情，三是帮助他保住了原有的汉语水平。瓦弗拉再三要求我们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转达他的感激之情，并希望节目越办越好。

瓦弗拉先生20年如一日，坚持收听中国广播，已成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忠实听众。许多年来，他还为加强中乌友好

关系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位忠实朋友。

甘当民间友好大使

采访之前，我们已了解到瓦弗拉先生于两年前创建了乌干达中国友好协会，目前他任乌中友协主席。当问及他当年创建乌中友协的初衷时，他说：“我在中国学习、生活时，当时正年轻，中国对我影响很大，我对中国感情很深。我想我应该为加强乌中两国的友好交流多做事，所以就创建了这个协会。”

从瓦弗拉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目前乌中友协有 100 多位会员，其中有前乌干达驻华大使及其他外交官，也有留学生、商人及其他方面人士。协会的活动包括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广播，放中国电影、举办中国情况报告会、收集介绍中国的宣传品等。最近还新增了一项活动，就是为初到乌干达经商的中国人免费提供咨询服务。瓦弗拉说，到乌干达做贸易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但他们大多不懂乌干达法律，有的连语言都不通，所以常有人上当受骗。因此友协当然应该设法帮助他们。他还透露说，乌中友协目前正在筹划开办汉语教学课，另外条件成熟时还将安排乌中两国文化团体之间的友好交流活动。

从瓦弗拉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为了创办乌中友协，他曾谢绝了穆塞维尼总统让他出任乌干达驻华大使的要求。当我们就此请他证实时，他笑着点点头，他说：“当官方大使不好，讲的都是政府的话，用不着自己动脑子。我现在还年轻，还能做很多事。当友协主席也是大使，是民间友好大使。这个大使好，自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今后有没有到中国当大使的计划？”

“有的。我非常想再去中国，但不是现在。我已向总统表示过，等我到 50 岁以后，再派我去北京当大使。”

“看得出你和总统关系非同一般，是吗？”

“是这样的。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乌干达‘全国抵运’，同总统一起打游击，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总统阁下本人对中国也很友好。”

为中国公司竞标尽力

瓦弗拉先生作为乌干达全国性大报《箴言报》(MONITOR)的总编，他很注意通过他的报纸宣传中国。他说，《箴言报》不但刊载由新华社提供的特稿，还经常派记者采写有关中国的报道，特别是报道有关中国公司在乌干达的经贸活动。说到这里，瓦弗拉随手找出一份《箴言报》递给我们，报上登着一篇关于中国浙江国际公司兴建乌干达国家体育场的详细报道。

瓦弗拉先生还向记者讲述了他本人一段十分感人的经历，那是有关他帮助中国四川国际公司参加乌干达金加大坝工程竞标的事。金加大坝工程是位于尼罗河畔的一项大型水电工程，整个工程耗资1亿多美元。因此，各国工程承包商为了争得这项工程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瓦弗拉先生说，在这项工程投标期间，一些外国承包商相继来到他的办公室，诉说参加这项工程投标的中国四川国际公司如何如何不行，要求他就此在《箴言报》上发表文章。为此，有的承包公司还给他带来了数目可观的现金支票。瓦弗拉告诉他们说：“好，我懂你们的意思，文章我答应发，但钱不能收。”

“结果呢？”我们问。

“发了。不但发了文章，还配发了图片。”

“……?!”我们听后有些茫然。

“不过不是他们希望的那类文章，而是恰恰相反。”瓦弗拉故意来个大气喘，停了片刻，才亮了底。说罢便是一阵开怀大笑，双方几乎都笑出了眼泪。

原来，瓦弗拉在打发走这一批批不速之客后，便立即与中国

四川国际公司驻乌干达机构联系，通报情况，同时索要介绍这家中国公司规模和实力的材料以及该公司以前修建大坝的图片。几天后，介绍中国四川国际公司的专文及图片便赫然刊登在瓦弗拉的《箴言报》上。

金加大坝工程于1993年秋开标，结果中国四川国际公司战胜了诸多外国公司，赢得了头标。应该说，四川公司是凭着自身的实力和经验得标的，但瓦弗拉先生的尽力无疑增加了一份得标的希望，而更重要的是他不为利诱，真心实意帮助中国的一片深厚情意。

不尽的中国情

“瓦弗拉先生，您对中国的友情实在让人感动。请问，您的这种情感对您的朋友和家人有何影响？”

听了我们的这个问题，瓦弗拉先生笑着告诉我们，他从没想到故意去影响他们，但无形中的影响确实有的。他举例说他的家人和他的所有好朋友都知道中国，对中国都很友好。显然，这与他十几年来反复不停地向他们介绍他在中国愉快的学习生活有关。瓦弗拉说，乌干达曾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的影响至今很大，例如许多乌干达人买东西时总是挑英国货买，似乎只有英国货最好。“但是，我就不是这样，我去挑中国货买，因为我在中国买过、用过，质量好、价格便宜，我信得过！”说着，瓦弗拉先生亮出自己穿的衬衣领子，上面印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字样，又指着办公室一角的落地电风扇说：“这也是正宗的中国货。我家里的中国货就更多了。”瓦弗拉告诉我们，由于他的宣传介绍，他的许多朋友都开始喜欢上中国货了。随着到乌干达的中国公司越来越多，中国货在乌干达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

瓦弗拉先生刚40出头，已是5个孩子的父亲。老大是女